

□梁茂春

“人文音乐史”浅议

摘要: 本文旨在呼吁音乐史研究应当具有人文精神。文中对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现状进行了反思,指出既往的研究存在“缺少真实”“内容单一”“欠缺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等诸多问题,认为中国音乐史研究应当提倡和坚持“人文精神”。

关键词: 人文音乐史;人文精神

DOI:10.14113/j.cnki.cn11-1316/j.2016.01.003

这次研讨会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美好的主题——中国音乐文化史。

“中国音乐文化史”,我简单地将之理解为“人本主义音乐史”或“人文音乐史”。“文化”者,“人化”也;“人化”者,“人文”也,“人本”也。“人文音乐史”是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一条光彩大道。

古今中外优秀的音乐作品,大凡都是人性真善美的结晶。正如丹纳所言:“一流作品必定追求和表现人性、人情、民族中最深刻而经久的特征。”^①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正如《尚书·大禹谟》所写:“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

当音乐历史的研究上升到人性、人文的高度时,即将音乐历史和音乐事件直接面对人的灵魂的时候,一切音乐问题就都相对地简单化了,一切(如国家、民族、地理、文化等)都可以超越了。历史判断的标准只剩下了人性——至高无上、人类共通的人性。正如梁漱溟所言的“对人有无好处,好处是大还是小,以此衡量一切”;又如墨子《非乐上》中所提到的:“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

只要是为了人,只要是对人的发展有利的和人的精神所需要的音乐,中西可以含化,新旧能够通融,雅俗不妨交汇,古今尽可互动。在欧洲,人文主义思想主要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约1350—1550)提出来的,其中心思潮是强调人的伟大,尊

重人的自由,要求文艺表现人的感情,为人的健全发展服务。欧洲人文主义观念是在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中形成的思想体系,它将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恩格斯曾认为整个欧洲近代史和现代自然科学是从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时代开始的,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格。”^②此后的欧洲在科学文化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迅猛发展,为人类创造了伟大的新时代,这都与人文主义思想带来了人的巨大创造力密切相关。对欧洲音乐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光芒四射的曙光。可以这样说:是人文精神孕育出了整个西方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

我的发言,主题就是呼吁音乐史研究中的人文精神。

“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致命问题是缺少真实,假冒伪劣、互相抄用的著述太多

作为人类整体历史一部分的音乐历史——如

作者简介: 梁茂春(1940~),男,中央音乐学院退休教授,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①〔法〕丹纳:《艺术哲学》,转引自《傅雷译文集》第15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57页。

②〔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4页。

“音乐文化史”或我所理解的“人本主义音乐史”——最重要的是看它所反映的历史是否真实。

“人本主义音乐史”最强调历史研究的“本真性”，“真实”是衡量音乐历史的至高的、唯一的尺度。真实的历史才有生命力，虚假的历史终究会被淘汰。正如胡耀邦说的：“历史是混不过去的。”这是历史的铁律。

中国传统历史学有优良丰厚的积淀，有司马迁、董狐的“直笔”传统，许多正直史家不阿权贵，不怕杀头，秉笔直书的范例。但是中国也有很坏的传统，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权势者讳，将许多历史真实讳避、掩盖起来。中国封建历史中还有野蛮的“焚书坑儒”传统，有残酷的“文字狱”传统。这种传统贯穿了中国通史。

中国历史上还有谄媚的传统，“当今圣上，当朝盛世，皇恩浩荡，万寿无疆”的“拍马屁”颂歌，数千年来沸反盈天，从未中断，不绝如缕。历史不可能总被蒙蔽，真实不可能总被掩盖，绝对不可能！尤其是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当代！所有的秘闻、内幕、绝密档案也将会陆续曝光。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有许多历史著述是不够真实的，人为的弄虚作假太多，故意的掩盖屏蔽常见，已经让历史变得面目全非。《红楼梦》中的一幅对联中有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把假的东西都当作真的了，真的东西也无人相信了。

检视我自己曾经撰写过或主编过的几本“音乐史”小书，也处处都存在着虚假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学生时期就接受了太多的历史教条，套上了无数的历史绳索。有一句话说：“戴着镣铐跳舞”，非常形象地形容了我个人的状况。

这好像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多样，持续的时间也很长，所以改变这个大困局需要一代人以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鲁迅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①这个批判太深刻了，太具有历史感了！

“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的严重问题是内容太过单一，缺乏丰富性

历史总是既复杂而又丰富的，音乐历史也应该反映音乐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人本主义音乐史”强调历史研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希望能够突破“大一统”“一元化”的历史叙述和史学模式，提倡历史书写的多种样式。

我们的音乐史满篇都是书写“主流革命”的内容，将聚光灯集中打在音乐官员、权威、名人、明星的身上。而“人本主义音乐史”更加关注那些音乐历史小径、支流和历史深处的话题，关注音乐中反映生活本质的凡人小事，留意于中国音乐史天幕上那些微末的星座，对每一位音乐历史人物都予以尊重，怀着虔敬之心。

我们曾经以“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为由排除了音乐史上众多流行歌曲，因此，黎锦晖、黎锦光、陈歌辛、姚敏等人的流行歌曲作品长期被排除在音乐史研究的视野之外。我们曾经以“唯心主义”、“迷信观念”为由屏蔽了各种宗教音乐，长期以来，在宗教音乐方面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如陈泗治、江文也、黄桢茂、黄永熙等人的宗教音乐作品，均未能够在我们的“中国现当代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人文音乐史最关心平民、草根的音乐生活。对于广大群众所乐意接受、容易欣赏的音乐形式，如大众流行歌曲、传统音乐等形式，都应该在现当代音乐史研究中受到足够的重视。

我个人的音乐史观念的严重束缚，主要是来自于20世纪50年代的音乐教育，当时的教育完全接受了苏联的一整套“音乐为政治服务”的体系，采纳了他们将联共（布）中央的文件当作音乐研究的唯一尺度和依据。这简直成了我的“心锁”，至今未得彻底解脱。

记不得是哪位历史家说过：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身陷在大历史的结构意志之中。这是一句富有哲理的真言。红尘俗世，谁都难于挣脱历史的枷锁。只有那些勇敢的、能够冲破历史囚笼的人，才能够写出真实、丰富而灵动、以人为中心的历史。

应该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史——以技术为主的音乐史，以形态为主的音乐史，以文化为主的音乐史，以政治为主的音乐史。在各式各样音乐史的最高处，则是“人文音乐史”。因为所有音乐史的研究，最后都终归聚于人性。

“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面对的许多作品是欠缺人性的，这是特别值得反思的问题

“人本主义音乐史”强调历史研究的“人文性”。

^① 鲁迅：《致孙伏园（1925年4月27日）》，见《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凡是为人喜爱和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音乐,于人的发展有利的音乐,都应该在音乐史学的研究视野之内。各种音乐体裁、音乐种类,在历史研究上应该是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

我们的现当代史曾经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人为“敌”。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到处都是阶级敌人,满眼都是特务反革命,资产阶级要打倒,地主阶级要消灭,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相应地,我们的音乐作品中也充满了阶级仇恨,以人为敌的斗争复仇主题的音乐作品随处可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中国特色”的音乐作品和音乐历史现象。

20世纪60年代中期广泛传唱过一首《红卫兵战歌》,音乐狂暴,如凶神恶煞,歌词中充满了“横扫”“砸烂”等凶恶的词句,如“文化革命打先锋”,“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横扫一切害人虫”,等等。当时曾有文章赞颂这类歌曲为“火药味”“战斗美”。这种美学,让人心惊胆战。

在阶级斗争泛滥肆虐的年代,人们都忠心地奉行“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观念。社会斗得乌烟瘴气,人被斗得斯文扫地。类似上述的蛮不讲理、摧残文明的歌曲震天动地。它们将人性中最卑鄙的部分展露无遗。而美好的人性,却完全被贫困和愚昧彻底蒙蔽。

中国当代的“爱情歌曲”曾经长期人为地消失,十年浩劫中竟然没有允许产生爱情歌曲,而只有“地下”流行的“知青歌曲”中有一些爱情内容。这实在是创造了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观。

再看“样板戏”中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她)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光杆人物,没有爱情生活,没有革命伴侣。如李玉和、杨子荣、方海珍、柯湘……,有一个《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也是“单干”的,她的丈夫阿庆也“跑单帮”远走高飞了。

缺乏人性的音乐作品总是缺乏艺术魅力的。有一个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1974年底,病中的毛泽东南巡到长沙休息,由中共湖南省委负责接待。毛泽东希望通过电视看一些文艺节目来调养身体,于是省委给他准备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样板戏节目。谁知道毛主席对这些东西一概不喜欢,他直接点了湘剧和花鼓戏的许多老戏,如湘剧《柜中缘》《祭头巾》、花鼓戏《刘海砍樵》

《打铁》《讨学钱》等。而这些传统戏,在当时全部是受到批判和扫荡的“旧文艺”。其中的花鼓戏《打铁》是一部滑稽戏。主人公姓毛,开了个毛家打铁店,他善于吹牛,自夸打铁天下无敌。一个壮士故意刁难他,让他受到了教训。毛主席对《打铁》看得很是津津有味,当时就从“里面”传出话来说:“主席看了哈哈大笑,还说这毛家的真是不可救药!”^①

毛泽东拒绝观赏革命样板戏而专门点看传统老戏的事情,对“革命样板”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而对“文革”本身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他当然要拒绝空洞的口号说教,而他喜欢的,却都是充满民间生活情趣的、充满人情味的、活灵活现的传统小戏。

“中国现当代音乐史研究”最欠缺的是独立思考 and 创造精神

人文主义所提倡、所重视的就是人的独立意志和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人文音乐史”所特别重视的是音乐史研究的创新思维,即史学家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当然,在中国研究和撰写“人文音乐史”绝非易事,因为我们曾经严厉地批判过“资产阶级人性论”,曾经再三强调过“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性是第一位的”。传统的思想还在捆绑着我们的思维。突破起来将会困难重重。因为创造精神要依靠人和制度,需要具有尊重和保护个性与少数的整个体系。

创造性思维的大敌往往是自己头脑中的习惯性思维——是“奶妈”传授给你的整套的习惯思维。所以,要尽量避免陷入固定不变的思维框架。要学会在高深的抽象思辨中超越俗人所不能突破的那一堵墙,要敢于做这种“撞墙式突破”,正如美国现代音乐大师约翰·凯奇(John Cage)所宣示的:“我要把我的头撞向墙壁”。

当前,中国的音乐生活已经初现了多元的状态,因此应该有多彩的音乐史著作来反映多元化的音乐现实。“人本主义音乐史”提倡叙述音乐历史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多种叙事方法,提倡音乐史学家的个人叙述风格。

^① 此事件参看崔小舟《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巡》,《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26期。此文后来又被转载于2015年10月23日《作家文摘》。

这需要史学家有一颗赤诚而善良的心，需要冷静而犀利的一双慧眼，一对慧耳，一颗慧心——“人本”之心。

创造精神正是我自己特别的“短板”。因为我所接受的是“听话”教育，要听领导的话，要听权威的话，要听上面的话。否则，就会犯错误。最保险的办法是当“鹦鹉”，只要会“学舌”就行，千万不要别出心裁。因此我当了一辈子“鹦鹉”。检点自己出版过的几本关于中国现当代音乐史小书，大多是“鹦鹉学舌”之作。都六七十岁了，好像还没有从精神上“断奶”，一辈子是“幼儿”，是听话的“孩子”，还要牵着权威的衣角，看着“上面”的眼色行事。

我现在思路好像有点变化，愿意循着“人本主义”的哲理寻找一下创造性的精神，无奈我已经进入了记忆退化、知识老化的风烛残年。我现在做什么都不可能逾越规矩了。但是，“人本主义音乐史”成了我对音乐历史研究的唯一念想。愿与同行和年轻的学者们共勉，甘当一个老学童。

中国音乐历来是一个孱弱、听喝、可爱的“小姑娘”，让她做谁的“奴婢”，她都只能顺从，别无

他法。而我们当下音乐史研究，既不应成为政治的婢妾，也不要成为经济的奴隶，也不要成为文化的奴婢。重心是研究至高无上的、神圣而神秘的音乐艺术，是独立自主的音乐史研究。

只有那些能够勇于用人文精神反思自己历史，又能用人文精神开创自己前途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人民却长久地处于历史的边缘。而历史终将回到亘古不变的人性，希望音乐史研究回到“人本”上面来。让音乐历史著作闪耀出人生哲理的光芒。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历史学家们长期不懈的奋斗。

音乐是人文精神绽开的花朵。愿全人类在美好的音乐中温暖相携，亲密相处。正如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在他的《第八（千人）交响曲》中所歌唱的：“点燃我们智慧的火焰，把爱注入我们的心田。”

人文音乐史，是我心灵的信仰。

附言：本文为笔者于2015年8月22日在“理念·视角·方法：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发言之后做了整理和补充。

《中国音乐学》创刊3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学》杂志社主办的《中国音乐学》创刊30周年座谈会，于2015年12月15日上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第五会议室隆重召开。居其宏、冯洁轩、张振涛、秦序、缪也、汪申申、金经言、薛艺兵、韩宝强、韩锺恩、孙建英、向延生、曾遂今、董建国、吴凡等《中国音乐学》历届编委、编辑部成员，音乐研究所在职人员，以及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音乐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音乐传播》《中国艺术报》等多家学术机构、媒体代表，共计四十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国音乐学》创办于1985年，由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30年来，本刊一直以客观、公正、严谨、包容为办刊宗旨，及时刊载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与最新成果，是中国音乐学界公认的高端学术平台，在全国各大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评选中长期位居艺术学科期刊前列。

本次会议由《中国音乐学》现任主编项阳主持。与会的历届编委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中国音乐学》的创刊发展历程，各学术机构、期刊代表对《中国音乐学》给予高度赞誉，对《中国音乐学》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充满信心。